

□游宇明

说起“包容”，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某个人说了另一个人坏话，损害了其利益，另一个人给予了原谅。这算不算包容？也算，不过，更准确的说法，这应该是宽容或宽恕。包容固然涵盖了宽容、宽恕，其含义却远比后者深广。

想起浩天的故事。浩天是在全国有些影响的小说家，业余时间不是采风，便是在书房阅读、写作，大大小小的书出了十多本。他的时间安排得很紧，每天哪个时段干什么，都有讲究。周围的朋友请他吃饭也好，喊他唱歌、跳舞也罢，都会被婉拒。他的一些朋友不乐意了，有说他不合群的，有批评他不懂得享受人生的，有讽刺他钻到钱眼里的。浩天说：我喜欢写东西，愿意将所有业余时间花在这上面，也没有拦谁当官、挡谁发财，难道有错吗？我说：您一点也没有错，值得反省的是您那些朋友。

我的话是真诚的。判断一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对不

□塞庐氏

敢，是英雄？不敢，是狗熊？且慢这么说。

司马懿是三国曹魏最出色的战将，深谙韬略和计谋，常常一马当先，也是他，奠定了晋朝的基石。他算是个狠角色了，然而却也有“不敢”的时候：

诸葛亮五出祁山，“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，累令兵辍战”，司马懿严令诸将“坚守勿出”，甚至说出了“诸将如再言出战者斩”的话。诸葛亮用激将法，“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，盛于大盒之内，修书一封，遣人送至魏寨……懿拆视其书，略曰：仲达既为大将，统领中原之众，不思披坚执锐，以决雌雄，乃甘窟守土巢，谨避刀箭，与妇人又何异哉”。这可说是极大的羞辱，司马懿虽然“心中大怒”，“佯笑”一阵后，依旧“受之不败”。在诸将忿怒，纷纷要求“即请出战，以决雌雄”之际，他又搬出曹主，“如再有敢言出战者，即以违旨论”。

如此不敢，窝囊吗？其实一点也不。他是看准了诸葛亮亮途奔袭，希望速战速决的心思，故意以拖待变——“彼久必自变”。

恰恰这是这不敢出战，气得诸葛亮吐血，自此“神思不宁”，终因积劳成疾，病逝五丈原，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。

这种不敢，实在是智的表现。司马懿显然不是狗熊。

老子《道德经》说：“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。”司马懿“勇于不敢”，“活”得非常成功。

□张勇

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刘备三顾茅庐，终于请出诸葛亮。有了卧龙先生，他如鱼得水，《隆中对》将三分天下规划得妥妥的，赤壁鏖兵、席卷荆襄、入主四川……诸葛亮出山，离不开两个重要人物的推荐：一个是水镜先生司马徽，另一个是徐庶。一个人能力再强，水平再高，没人推荐，可能就像埋在土里的金玉。自古及今，多少文人武将怀才不遇，报国无门，徒自嗟叹。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“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洲”“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鬓衰已先斑”。古代社会流动性低，如果没有门第的荫庇、权贵的引荐，身份卑微的蔣相如即便富有五车、才高八斗，也只能“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羨鱼情”。

当然，诸葛亮可以自己跑到刘备面前，说他高卧隆中、自比管乐、饱读诗书、六韬三略。他大概率不会这么做，即便这样做了，刘备的重视程度也将大打折扣。可见推荐的重要性。推荐人越是重量级，被推荐成功的可能性越大，被推荐者的分量往往也会越重。

推荐什么人，考验用人观念，诸葛亮在这方面有着独到之处。他曾写过一段论诸子的文章，对古人的性格特质分析切中肯綮：“老子长于养性，不可以临危难；商鞅长于理法，不可以从教化；苏、张长于驰骋，不可以结盟誓；白起长于攻取，不可以广众；子胥长于图敌，不可以谋身；尾生长于守信，不可以应变；王嘉长于遇明君，不可以事暗主；许子将长于明臧否，不可以养人物。此任长之术者也。”诸葛亮凭借自己的独到眼光，在刘备面前举荐众多贤才。他敏锐地发现了庞统的军事才能，与鲁肃一同向刘备极力推荐，职位与自己同级，以博大的胸襟和宽宏的气度助庞统青云直上，大展宏图。《出师表》中这样举荐向宠：“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，试用于昔日，先帝称之曰‘能’，是以众议举宠为督。愚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阵和

对，第一应该考量的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公序良俗。公序良俗规范着一个人与他人、社会的关系，是我们的行为合理合法的基本标尺。这个环节过了，我们就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。你工作时用了心，尽了力、做好了该做的事，到了节假日，想游山玩水、搓麻将鱼、舞剑学棋，都是正常选择。反过来，人家觉得自己的精力非常旺盛，既能在职业领域跋山涉水，又能在某个职业之外的方向横刀立马，也应该认同。何况，每个个体的奋斗最终都将助益整个社会，奋斗的人越多，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越丰富，普通人也越能产生幸福感。

包容意味着接纳不同的人生面相。你学了农学专业成为科学家，当然很好；我回去做个新型农民，让自己所种的田产量高于当地其他农民，也非常不错。你业余画画，画几笔就停，只当自己喝了一盏茶或做了一遍广播体操，潇洒；我将画画当成事业，在亚洲办了画展还想去

欧洲，惬意。自己干了件什么事，产生了成就感，认为别人也必须跟着来，既狭窄又愚蠢。

人的出身、经历、所受教育、思维高度迥然有别，性情自然也各有不同；有人血气方刚，遇事即会出手；有人性格平稳，泰山压顶眉毛都不跳一下。在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固然要提倡绅士、儒雅，但面临邪恶，具有血性的人更受人敬重。如果不能包容他们，正义就难有生存空间。

包容也告诉我们必须尊重不同意见。行走在尘世，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千差万别，在单位所处的位置也有高有低，遇事意见相左，并不奇怪。此时，最需要的不是将别人的看法踩在地上，而是让不同的观点互相碰撞，从大狗叫小狗跳中求得共识。

包容最忌讳自恋。一个人老觉得自己这里正确那里高明，就会潜意识地看低别人，导致包容心的丧失和指导欲的

统一的。

有所敢，也应有所不敢。敢什么？敢于担责、拼搏、任事，以及敢于批评庸俗鄙陋、阿谀奉承，拒绝藏垢纳污、利益输送，凡此种种，都应该有所敢。不敢什么？战争，不敢暴虎冯河；为人处世，则应该不敢巧舌如簧、两面三刀，矫饰谄伪、吮疽舐痔，不敢忘记初心、违背良心、践踏纪法。

然而，有些人却是应该不敢的却十分敢，应该敢的却又往往不敢。比如，在干事创业上不敢闯、不敢试，浑浑噩噩，选择躺平，然而，对道德、纪法，却又无所敬畏，满面红光地周旋于觥筹交错，油头粉面地流连于灯红酒绿，从红包到红颜，从字画到豪宅，什么都敢“笑纳”，真正是敢于徇私枉法、勇于巧取豪夺。这种敢，说到底，是欲壑难填、得意忘形。自然，到头来，某些人的这种敢，终究会让他们不敢的——不敢再和尚撞钟、胡作非为，最终则是让他们没有再“敢作敢为”捞钱渔色的机会。

时代需要的敢作敢为，是英雄们敢于开拓进取，敢于勇猛精进，敢于披坚执锐，乃至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

有所不敢，探幽索微起来，体现的是对本心的坚守、本真的恪守。

北齐时，奸臣和士开独揽朝政。一众官员都拜其门庭、投其所好，并趁机为子弟谋求一官半职，因此“世门之胄，多处京官”。崔劼却把两个儿子都派往外地，其弟不解并质问他，为何不把两侄安

味。幸运的是，这份决心和勇气没有被辜负。赵王对他所推荐的蔣相如委以重任，在“求人可使报秦者”而“未得”的着急情况之下，让蔣相如得以一跃步入将相之列，位在廉颇之右。当然，蔣相如也不负厚望，不辱使命。

通过这样的推荐，我们也看到，推荐别人，一定要出于公心，还要有胸襟和气度，不能怕别人超过自己。推荐谁，是心术正不正、胸襟开阔与否的重要试金石。

管仲年轻时和鲍叔牙一起做买卖，利润管仲总比鲍叔牙拿得多。别人为鸣不平，鲍叔牙却说：管仲家里穷，需要钱，我是主动让他拿大头的。他俩一起去打仗，每次进攻的时候，管仲都躲在最后，别人说管仲贪生怕死，鲍叔牙却说并非如此，他还有老母亲要照顾。后来鲍叔牙在齐桓公面前极力举荐管仲相齐，鲍叔牙心甘情愿给他做助手，二人合力辅佐，齐国“一匡天下，九合诸侯”，成就桓公霸业。

公元前645年，管仲病危。齐桓公问管仲群臣中谁可以担任相国的职务？并且提到“我想用你的好友鲍叔牙”。不料管仲却提出反对意见。他认为鲍叔牙是好人，也很方正，在做人的道德上是第一等人，但丞相这个职务肩负非常复杂的政治责任，并非是一个一味讲究方正的好人就能胜任的。后来鲍叔牙知道了这件事，很欣慰地说：“管仲是最了解我的好朋友，我的确不能担任丞相，否则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。”

推荐一个人，一定得权衡好能力是否和岗位相匹配，做到人尽其才，否则非但荒废政事，也容易坑了朋友。唐朝史学家吴兢在《贞观政要》里拿饼做比喻：“官不得其才，比于画地作饼，不可食也。”才能配不上职责，就像在地上画饼，只能看，不能吃。

如此冒险推荐，实属不易，颇有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意

膨胀。其实，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人，往往并非真正站在高处，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而已。那些拥有大格局大视野的人，恰恰是谦逊的，懂得体谅、理解别人。

几千年前，孔老师要学生谈理想，有的学生牛皮兮兮，说一个中等国家到我手里只要三年便会如何如何；有的学生相对谦虚，说我治理个小国也许可以，不过某些事依然得别人帮忙；有的学生说我只能干小事，做个礼宾什么的，成不了大气候；有的学生隐士味较重，说我想过得潇洒点，游个泳唱个歌就不错……高大上的孔老师没有批评任何人，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梦想，通过这种梦想带动学生反思自己的言行。孔老师的包容透过《论语》发黄的纸页依然显出灿灿的光芒。

或许包容就是这样：一个人并未刻意对方做什么，却使对方感到你的温暖无所不在。

排在京城繁华之地，谋得一份好工作，却要去做偏僻地方受罪。崔劼的回答是，他不敢把儿子留在鱼龙混杂的京城，即便留下也难有作为，不如让他们到条件差但纯朴、清静的地方施展才华，并态度鲜明地说：“立身以来，耻以一言自达，今若进儿，与身何异。”

崔劼的不敢，是不敢曲意逢迎，不敢网罗关系。其不敢，实乃大敢，敢不趋炎附势，敢不随波逐流，敢守住内心，敢清俭勤慎。

有时候，恰恰是：不敢，是英雄；敢，才是狗熊，是蠢种，是痞子。

敢中有不敢，不敢中有敢，乃是“有所敢”与“有所不敢”的真谛。

□汪金友

我们不是好惹的

真有那么硬的后台，早就出来替她们摆平。是她们嘴巴硬？这倒有可能。像鸭子嘴，煮烂了肉，嘴也不软。

想那“黔之驴”，初到黔地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更不知老虎众多，于是放喉高鸣，令周围老虎“大骇”“甚恐”。但婆孙俩不知，躲开老虎，并未真的远遁，旁观的看客，不会真的无声。就在婆孙俩在那里施威的同时，早有人实录为证。等她们转过身去，马上全网皆知。对错是非，自有公论。等她们醒悟过来，早已是一片骂声。

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没有人敢言“不好惹”。不管你是山上的、川上的、京城、乡下的、天南的、海北的，也不管你是有钱的、有权的、有名的、拳头硬的，全都得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。

要说不好惹，也有几个。

其一是法律不好惹。社会越进步，法律就越严密。你不惹它，它也不会惹你。倘若有一天，你以为法律好欺负，或觉得没人会发现，然后跨越法律的红线。那么从此以后，你永远都不会安宁。说不定哪一天，法律就会找上门来。到那时候，再多的钱，再大的权，都无济于事。触犯就要付出代

国海陆二军，连战连北之因，苟使虚心平气以查之，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，以阁下之英明，固已知之审矣。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，固非君相一己之罪，盖其墨守常经，不通变之所由致也。”“夫大厦之将倾，固非一木所能支。苟见势不可为，时不利云，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，诚以些些小节，何足挂齿？仆于是乎指誓天日，敢请阁下暂游日本。切愿阁下蓄余力，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，宣劳政绩，以报国恩。阁下幸垂听纳焉。”一番虚情假意的背后暗蕴着欺诈、威逼、引诱。

在接到这份劝降书后，丁汝昌丝毫不为所动。当时北洋水师中则有一批人在力战不胜的情形下，考虑向日军投降，甚至持刀威胁丁汝昌，逼他赶快投降。丁汝昌直面日军海陆围攻威海卫，北洋舰队屡受重创，被困刘公岛，内无粮草外无援兵，又在投降派的胁迫下而不能执行统帅的权力，于2月11日夜间怀揣“苟丧舰，必自裁”的信念，服毒自尽，以身殉国。虽说丁汝昌是在接到劝降书19天后即自杀，史书上也没有片言只语记载他当时的表情和言辞，但他视死如归，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气概义薄云天！诚如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在《北洋海军》一书中对这位民族英烈的评价：“丁汝昌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应有品质，他竭尽所能，抵抗日本的侵略，临危不惧，死而后已，和那些可耻的逃跑将军、投降将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”

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“临危不惧，死而后已”，何来“投降”一说？2023年5月10日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发表声明，承认“该书确实存在不当插图问题”，并表示：“停止该图书的线上线下销售，全面收回销毁。”这件事提醒我们，亟需举一反三，对我国图书（尤其是“写给孩子看”的书）来一番盘点、自查、整改，清除诸如“丁汝昌投降”那般的污水浊泥，还出版界一片净土。



恋爱的花

王成 摄